



NEW
ENLIGHTENMENT
SERIES * 3

新启蒙

异化概念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新 启 蒙 (3)

论异化概念

主 编: 王元化

责任编辑: 龙育群

编辑: 王大象 冯媛 陆晓光

湖 南 教 育 出 版 社 出 版 (长沙展览馆路3号)

上海东方图书公司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印张: 2.75 字数: 65000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355-0769-7/G·801

定 价: 1.20 元

论异化概念

于 浩 成

人们应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1)

韦 政 通

当代新儒家心态 (24)

包 遵 信

韦政通和当代新儒家 (40)

高 尔 泰

论异化概念 (50)

尤 西 林

人的管理的人道主义涵义 (69)

胡 鉴 美

消费品的分配应该货币化 (79)

编后 (84)

New Enlightenment Series (3)

On Alienation

- | | |
|----------------------|---|
| Yu Haocheng | People Should Enjoy the Freedom from Fear |
| Wei Zhengtong | The Mentality of New Confucians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
| Bao Zunxin | Wei Zhengtong and New Confucians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
| Gao Ertai | On Alienation |
| You Xilin | The implication of the Humanitarianism of Administration over people |
| Hu Jianmei | The Distribution of Consumer Goods Should Be incarnated in the currency |

人们应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于 浩 成

从“蛇口风波”谈起

去年1月13日，深圳蛇口举行了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出席座谈的有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研究报告员李燕杰、曲啸、彭清一三位同志和蛇口近70名青年，对这次座谈会，国内报刊曾广为介绍，至今余波犹存。《人民日报》于8月6日发表了曾宪斌在采访了李燕杰、袁庚等各方有关人士后写的《“蛇口风波”问答录》，随后又就这件事在该报上展开了讨论，在蛇口这样一块弹丸之地发生的这样一件小事竟然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有人甚至称之为了一颗“重型炸弹”，当然绝非偶然的，因为这场风波实际上关系到或反映了全国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不可避免的大争论——在新时期如何做好人们的特别是青年的政治思想工作，如何改进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以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问题。但是，我以为在这场风波中有一个情节更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这就是如下的一个情节：在三位青年问题工作者与蛇口青年对“淘金者”这一提法发生争执时，其中一位便对质问他的青年说：敢不敢把你的名字告诉我？那个青年人当场递上了自己的名片。接着就有以“北师大青年教育研究所”名义所起草的一份材料，认为与会青年有“较为明显的错误言论”，“整个气氛是嘲弄的甚至是敌对的”，递名片青年的名字也被上了“材料”。对于这一情

节，蛇口招商局董事长袁庚的意见是：“我们不欢迎教师爷式的空洞说教，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要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这种作风连我这个老头都不能容忍，青年人是不欢迎的。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希望记者同志一定要把这个观点报道出去，这是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所以，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见《人民日报》1988年8月6日）袁庚在今年7月蛇口召开“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政治发展”学术讨论会期间接受《世界经济导报》记者访问时，也讲了同样意思的话：“在对话中查别人的名字是不可取的，即使不同意别人的意见，也要誓死保卫他的发言权利，没有这样一种使人免除畏惧的环境，就不会有一种进步的原动力。”^①

袁庚所说的“没有这样一种使人免除畏惧的环境，就不会有一种进步的原动力。”确实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明年我们将隆重纪念建国四十周年和伟大五四运动的七十周年。即以文艺界的情形而言，我们在建国以来究竟出现了哪一些伟大作品？出现了哪一些其名字可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等人比肩并立的文学家呢？不久前逝世的沈从文在建国以后即停止写作，改行去研究古代文物；老舍曾在建国以后创作了《龙须沟》、《茶馆》等名篇，但终于在那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期间被迫效法屈原自沉于太平湖。“创造一种使人免除恐惧的环境，”这个问题对我国说来，确实太重要了，因为，“没有这样一种使人免除畏惧的环境，就不会有一种进步的原动力，”如果

①（《创造一种能够容忍不同意见的制度环境——蛇口访袁庚》，见《世界经济导报》1988年7月11日第二版）

说，这是一个事关我国改革成败，我们民族盛衰的大问题，恐怕绝非小题大做，危言耸听，创造一种使人免除恐惧的环境，也就是每个人都应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免于恐惧的自由”的提出

“免于恐惧的自由”是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和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于 1941 年 8 月 14 日在停泊于纽芬兰的普拉森夏湾的《奥古斯塔》军舰上签署的“大西洋宪章”上首次提出的四大自由之一。这四大自由就是言论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崇奉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实际上，这四大自由的提出还要更早一些，是罗斯福于 1941 年 1 月 6 日在美国总统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首先提出来的，他在这一咨文中写道：

“在我们力图保持安宁的今后的日子里，我们盼望有一个建立在四项人类基本自由的世界。

第一是言论和发表意见的自由一遍及世界各地。

第二是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崇奉上帝的自由——遍及世界各地。

第三是不虞匮乏的自由——从全世界角度来说，这就意味着可以使每个国家保证其居民过上健康的和平时期生活的经济谅解——遍及世界各地。

第四是不虞恐惧的自由——从全世界角度来谈，这就意味着世界范围的裁军，并使之如此全面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任何国家都不会处于能对别国采取有形侵略行为的地位——遍及世界各地。

这并不是对于遥远的大同世界的幻想，这是在我们自己一代人的时代就能实现的一个世界的具体基础，这一世界恰恰是专制主义的所谓新秩序的对立面，独裁者们正在企图在炸弹爆裂声中

创造那个新秩序”（见《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 1982 年出版，第 279 页）。

大西洋宪章的历史意义是它反映了为反对法西斯侵略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战斗目标和共同要求。四大自由的提出是符合全世界人民的愿望的，陷于侵略战争苦难和受到战争威胁的各国人民普遍希望大战后的世界应是一个和平、自由、解放的世界，在这个新的世界中，任何国家不得侵占别国的领土并保证各国人民有选择自己政体的权利。1941 年 9 月，在伦敦召开的苏联、法国和其他同法西斯德国作战各国参加的会议上，讨论并接受了大西洋宪章。1942 年 1 月 1 日，支持宪章的各国政府在华盛顿签订二十六国宣言，即历史性的《联合国宣言》。大西洋宪章事实上成为反法西斯国家团结战斗的政治纲领，也是后来的联合国宪章的基础。

四大自由尽管是资产阶级政治家首先提出来的，但是确实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当时，呻吟于法西斯暴政下德意日等国的人民或饱尝德意日法西斯国家侵略战争之苦难，在颠沛流离中的各国人民，无不希望在战后的世界是一个和平，民主，自由，解放的新世界。德国法西斯在奥斯威辛、布痕瓦尔德等地建立的集中营屠杀成千上万无辜人民的骇人听闻的罪行，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和在平顶山等地制造万人坑惨案，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的惨绝人寰的暴行等等，极大的教育了人民。各国人民一致奋起为争取自己的自由和解放而斗争。在苦难中的人民相信：“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法西斯侵略势力是一定要被打倒的，人民民主势力是一定要胜利的。”（见《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 932 页）我还清楚地记得 1945 年在延安时大家唱的一首苏联歌曲，作曲者好像是杜那耶夫斯基，歌词是：

“太阳在天空现出笑容，

大地发出雄壮的歌声。
全世界人民在歌唱，
祝颂新世界的诞生。
同盟国万众一心，
打倒敌人。
向着自由解放的新世界，
前进！”

世界第二次大战，也就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至今已有四十多年了。虽然世界是在进步中，人民赢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但是地方性的局部战争一直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在许多国家中还没有建立起民主制度，人民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选择自己政体的自由等权利还受到很大的限制，即以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苏联和我国来说，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实际情况距离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①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即以苏联共产党内来说，据新华社电讯，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已通过决议在莫斯科为斯大林时期的受害者建立纪念碑，《莫斯科新闻》于1988年7月6日发表文章披露当时的一些情况，文章说，1934年苏共十七大当选为中委和候补中委的有139人，到1939年召开十八大时只有24人还留在党内，余下的大部分遭到迫害。^②据赫鲁晓夫于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秘密报告透露，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就有70%被宣布为党和人民的敌人，在1966名代表中，因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占一半以上——1108人。图哈切夫斯基、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635页。

② 新华社莫斯科1988年7月6日电讯。

布哈林、委诺维耶夫、加米涅夫等人的案件直到不久前才获得平反。连苏共党内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普通人民遭受的政治迫害情况是多么严重了。据苏联报纸报道，由于苏联肃反扩大化受迫害者总数有人估计为 7400 万人，其中 1200 万人进了劳改营，2000 万人因反对斯大林在 1929 年到 1933 年强迫实行的农业集体化而获罪的个体农民不是进了劳改营就是被判流放西伯利亚或其它边远偏僻的地区。4200 万集体农庄庄员失去了国内护照，致使他们无法再改换工作或旅行。^①也许有人说这些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情况，但有名的列宁格勒案件和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都是在战后发生的，在列宁格勒案件中，库兹涅佐夫，沃兹涅斯基、罗季奥诺夫、波普科夫卡普斯京被判处死刑，由于这一案件而遭迫害的有二百多人，从 1947 到 1949 的三年之内有两千多领导人被撤职。^②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发生在斯大林逝世前不久，1953 年 1 月 13 日苏联宣布一批医学界泰斗，在克里姆林宫为领导人治病的主治医生等为英美等国间谍，指责他们谋害了日丹诺夫和季米特洛夫，随后这些医生遭到逮捕和迫害，其后，克里姆林宫主治大夫之一的维诺格拉多夫发现斯大林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在病历中写下病中要绝对休息的意见，建议他完全停止一切活动。这个建议被认为是中断斯大林一切政治活动的阴谋，不久维诺格拉多夫即被逮捕，接着在战时曾任红军主治内科大夫的米龙、沃夫西等一批医学权威相继被投入监狱，他们的妻子也遭逮捕，子女被解除职务或被开除出党和共青团。^③另据苏联卫生部精神病学负责人亚历山大·舒尔金于 1988 年 2 月 11 日宣布，

① 据苏联作家尤利安·谢苗诺夫在《莫斯科共青团员报》上报道，转引自英国《巴尔的摩太阳报》1988 年 2 月 26 日文章。

② 苏联《共青团真理报》1988 年 1 月 15 日阿法纳西耶夫文章：《胜利者》。

③ 据 1988 年 2 月 3 日《莫斯科新闻》报道。

苏联 200 万精神病人的名字将从精神病人名单单划去，说这是改革的一部分，旨在结束滥用精神病案例的行为，舒尔金说苏联准备重新参加世界精神病学会，“条件是学会中必须有工作气氛，不讨论政治问题。”（苏联于 1983 年退出世界精神病学会，当时西方的精神病科医生指责苏联说，在苏联有不少身体很健康的人由于持有不同的政见而被关进了精神病医院）^①据苏联报刊报道，近年来一些被禁锢多年的文学艺术作品陆续解禁，与我国在“文化大革命”这后出现的伤痕文学颇为类似的被称为“反思文学”作品纷纷问世。其中大部分作品并非创作于最近几年，例如布尔加科夫的《狗心》创作于 1925 年，普拉东诺夫的《基坑》写于 1930 年，伊萨科夫斯基的长诗《关于真理的童话》写成于 1945——1946 年，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有权回忆》的创作始于 1963 年，阿佐利斯基的《斯捷潘·谢尔盖伊奇》1968 年写成，雷巴科夫的长篇《阿尔巴特街的孩子们》完成于 1966 年——1985 年，谢·安东诺夫的《瓦西卡》成书于 1957 年，格拉西莫夫的《敲门声》创作于 1960 年，杜金采夫的《白衣》的创作始于 30 年前，普里塔夫金的《有过金色的云……》写于 1981 年。这些作品都由于政治原因长期未能问世，其中布尔加科夫的《狗心》竟湮没达 62 年之久，许多作家都未能看到自己作品的发表而离开了人世^②。苏联的电影界的情况也是如此，苏联很长一个时期有不少已摄制完成的影片，出于政治原因，当时没能公演，如影片《忏悔》、《瓦西里·贝科夫》、《崛起》、《电的祖国》、《苏醒》、《人生的考验》等，还有个别影片上演不久即被禁演，如《晴朗的天空》等影片。《忏悔》早在 1984 年就拍摄完成，但一直被禁演，直到 1987 年初才开始公演，这部以高度象征手法抵

①据法新社莫斯科1988年2月11日电讯。

②《苏联出现文学“反思热”，1988年3月26日《光明日报》第4版

制专制作风的影片公演后引起极大的反响。有的观众竟买了一天各场的票，从早一直看到晚。1987年5月在第二十届全苏电影节上，这部影片获得了特别大奖，在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也荣获评委会特别奖。^①

我国的情况比苏联也并不更好一些。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王实味就因为写了《野百合花》受到过批判，错被当作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后在1947年被杀掉了，建国以来政治运动一直接连不断，而这些运动的直接目的就在于压制不同意见，箝制人口；如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和1957年反“右派”斗争几乎把全国知识分子的嘴巴都封住了。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则几乎把党的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的嘴巴都封住了。到了“文化大革命”，对人民的民主权利的侵犯和言论自由的压制更发展到极端，不但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迫害致死。老舍、邓拓、吴晗、傅雷等大批作家也蒙冤含恨告别人世。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以言获罪的情况较之明清时代的文字狱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党一再重申会后一般不再搞什么政治运动，实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方针”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这方面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人们的处境较前确实已经宽松得多了。然而，由于过去的积习太深，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根除净尽，特别是明文载入现行宪法的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和进行科学研究、文艺创作的自由还缺乏专门的法律（如新闻法、出版法、结社法、游行示威法等）切实加以保障，因此以言获罪的情况还不能说已经完全绝迹，至于在内部会议上和《言论摘编》一类内部材料上被点名批

^①张健：《从“晴朗的天空”到“忏悔”》《人民日报》1988年3月20日第七版。

判等事情更时有所闻。总之，那把达摩克里斯之剑始终还高高悬在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其精美人物头上，反法西斯战争中提出的应使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一美好理想还远远尚未实现。

早在 1945 年 4 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作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就提出“人民的自由”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指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何以在 40 多年以后的今天，这些自由似乎还离我们十分遥远呢？最近有一天下午我到我家附近的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散步时，忽然又想到上面提到过的杜那耶夫斯基作曲的那首歌：“向着自由解放的新世界前进”，当我想到人民在战争中和在战后为争取自己的自由和解放付出了如此巨大牺牲和沉重代价，但人民的美好希望却一次又一次的落空时，我不禁伤心落泪了，我回想起 1945 年 8 月 15 日夜里在延安一间窑洞里当外面传来日本投降的喜讯时，大家欣喜欲狂，彻夜狂欢不眠的情景，当时漫天遍野都传来锣鼓声，鞭炮声和欢呼声，人们不约而同地想起并示诗圣杜甫那首著名的感人诗篇：“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然而好景不长，蒋介石很快就撕毁了和平协定，全国人民又陷入内战的苦难中。北平解放时，我正在石家庄，当时的欢乐心情也是难以形容的。第三次狂喜是 1976 年 10 月，我正在地震灾难后的唐山做救灾善后工作，忽然传来了人人痛恨的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束手被擒的大好消息，人们痛感自己是获得了第二次的解放，心头又燃起了希望的火花，专制和高压的日子即将过去，此后大概可以安居乐业，心情舒畅地过活了，可是随后而来的无情的事实又给人们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当然，一次一次的挫折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擦亮了眼睛，认识到封建主义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源远流长，根深蒂

固。建立民主政治，实现人民自由是非常艰巨的一场斗争，绝非轻而易举，可以一蹴而就，有待于人民的长期的艰苦的韧性的战斗。我们既不能犯急性病，又不能灰心丧志，失去胜利的信心和前进的勇气。

保卫人权的口号并没有过时

使人民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也就是使人权得到保障，对我国说来，也就是使现行宪法明确规定的公民的人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造和其他文化活动等等的自由权利（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36、37、47等条）得到充分实现和切实保障，人权问题是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但是在我国却一直几乎成为一个禁区。在50年代的党的文件和领导人的报告中还曾提到保障人权的问题，如1956年周恩来在全国各省市检察长、法院院长、公安厅局长联席会议上讲过：“人道主义是指对已经依法办理以后的人，至于依法办的对不对，是人权问题，是守不守法的问题，”1957年2月，董必武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也曾提到：“目前农村中较普遍存在的是贪污、偷窃、打架、哄闹以及侵犯人权等现象。”但从50年代后期起，保障人权的问题就很少提到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尽管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连国家主席的人权都得不到任何保障，有些人却仍否认我国还有人权问题。刘少奇是在批斗、抄家、坐“喷气式”、拳打脚踢、非法监禁，受尽折磨之后惨死在开封的。有人目睹他死时的情景是“躺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身上盖着一个白床单，一尺多长的白发蓬乱着，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了，下颌一片淤血……”（详见刘平平、刘源、刘亭亭写的《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一文，将入《历史在这里沉思》一书，华夏出版社第一卷，1986年出版）共产党员张

志新仅仅由于坚持自己的政治观点，就被逮捕，监禁并以“恶毒攻击”的罪行被秘密处死，在行刑前还被残忍地割断了喉管。类似的事实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简直可说是罄竹难书，然而，我们有些人却闭起眼睛，根本不认账，竟然说什么在我国根本不存在人权问题。我国报刊上曾于1979年一度出现“批人权”的文章，说什么人权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后来又于1983年一度出现大批特批人道主义的浪潮。总之，把一切带人字的，如人性、人格、人权，人道主义等都当成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拱手让给资产阶级了，这在理论上完全是错误的，混乱的，在政治上则是十分有害的。这种错误做法极大地阻碍了我国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曾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1986年9月28日）。事情正象夏衍在今年6月接受记者访问时所说的那样：“象当年创作中国报告文学典范作品《包身工》一样，夏公对‘人’的问题有着自己的见解，他批评了一种观念，以为社会主义国家是不讲人权的，凡是带人字都犯忌，如人权，人性、人格、人道等都不行，周扬讲了人道主义还挨了批，但这些都是民主、最起码的东西啊！现在连人权都不敢讲，把自由、平等、博爱都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批，搞创作自由也要挨整，所以里根就用这个东西来对付戈尔巴乔夫，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么？‘现在提出以生产力发展为标准，但生产力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人，长久以来却是我们最忽视的，诸多弊端便由此而生’^①

今年12月10日将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四十周年，我国代表近几年来在联合国或其他国际会议上讨论人权问题时总

① 《世界经济导报》1988年6月20日第16版。

是躲躲闪闪，力图回避，似乎是理不直气不壮，一直陷入被动的局面。苏联代表也是如此。美国总统里根去莫斯科同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会谈时首先提出把人权问题列入议程，而苏方则表示拒绝，显得十分被动。在一些国际会议上，保障人权已经被公认为国际法的一项普遍原则，而我们总是藉口不容许别国干涉内政拒绝讨论本国的人权情况，但这种藉口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人家可以反问一句：既然人权是各国的内政，你们为什么还不断发表声明谴责南非的种族歧视呢？南非不是也可以说这是本国内政，拒绝别国加以干涉吗？其实，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讲，首先，我们可以指出，国外有些人是没有资格侈谈保障人权问题的。外国侵略势力曾经帮助我国军阀、官僚、买办，地主阶级屠杀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劳动人民。在旧上海一些公园门口曾经挂上“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中国人的人格遭到这样的侮辱，还有什么人权可言呢！国外敌对势力又有什么资格再来谈论我国的人权问题呢？其次，应该指出，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人权受到蹂躏以及当前存在的某些侵犯人权的现象并非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产生的，这些现象恰恰是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结果，而且这些现象一经发现，我们党和政府总是采取措施设法加以纠正的。

什么是人权呢？人权就是人的权利，它排除了民族、种族、宗教、国籍、性别、年龄等等差别，特别是阶级差别、包括了一切人，具有普遍性，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人权称之为“权利的最一般的形式”^①正象有些人不承认有普遍的人性一样，他们也不承认有什么包括一切人都在内，具有普遍性的人权，这些人经常引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这样一段话做立论的根据：“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28页。